

[美] 约翰·C. 哈索克 著

John C. Hartsock

李梅 译

美国文学新闻史

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The Emergence of a Modern Narrative Form

[美] 约翰·C. 哈索克 著

John C. Hartsock

李梅 译

美国文学新闻史

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The Emergence of a Modern Narrative For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美]约翰·C.哈索克(John C. Hartsock)著；李梅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ISBN 978-7-309-13956-3

I. ①美… II. ①约…②李… III. ①新闻写作-新闻事业史-研究-美国 IV. ①G219.712.9②I71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492 号

John C. Hartsock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The Emergence of a Modern Narrative Form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Copyright© 2000 by John C. Hartsoc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7-585

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

[美]约翰·C.哈索克 著 李 梅 译

责任编辑/方尚芩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 字数 249 千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956-3/G · 1900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妻子琳达、儿子彼得及我的父母约翰和莉迪亚

中文版序

在研究美国文学新闻史的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着对其隐含内容的一种非常本质性的反思。我注意到，每个人对于理解那些被描述为“日常经验美学”的事物有着共通之处。那些共通的看法和理解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相信，可以断定的是，最强大有力的形式就是美国文学新闻。

因为这样的一种新闻形式确实对表达我们都能感知的事物有着语言叙事上的吸引力，它洞察人类生活状况的内幕，这一点主流新闻形式却做不到，因为它经常陷入世俗话语之中，并任其编排。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理解这些观点时，总是带着我们自己独特文化的看法。尽管如此，日常经验美学还是为产生新观念的、具有“貌似狂欢”性质的生活理解提供了机会，它会出现在文化建构形成的边界和条框之外。在诠释交流的过程中，就是对我们世俗话语的一种颠覆^①。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抛弃那些阻碍理解社会真相的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和庸俗化，并找到新的诠释和更新方式——社会、文化、个人、哲学等，这种颠覆是必须的。我认为，这便是以下文章中讨论的文学新闻的核心，关于文学与新闻的论述。

我不认为我的研究能解答所有疑问，这当然不能。原因之一就是新闻

^① 我在最新出版的《文学新闻和经验美学》一书中全面探讨了文学新闻中日常审美经验的角色及其颠覆性。

与文学之关系的学术研究仍然处于相对初期，还有太多研究有待进行。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促进我的中国同仁关注并提出有关两者关系的问题，以及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如何从跨学科研究中受益，我一直认为这两个学科不应该长期处于不幸的学科分离状态。之所以说它不幸，是因为我相信这里所探讨的文学新闻能提供一些最为引人入胜的，甚至是意义深刻的文化研究。我希望我的读者会赞成我的观点。

此书是我亲爱的同事——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梅教授努力的成果。至此，中国相关领域的学者可以关注到几年来在此领域的努力。我必须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院长布鲁斯·马廷林，正是他努力从“科特兰学院基金”中为我争取到资金以帮助部分版权费用。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

但我最感谢的还是李梅教授。没有她对此研究领域的关注与努力，这本书的汉译是没有可能的。她认为文学新闻研究是中国新闻研究领域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实践意义且尚待开拓的学术领域，并认为本书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反响。

我衷心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促进我与中国同仁的进一步交流。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传播学院教授

约翰·C. 哈索克博士

2017年1月

译者导言：文学新闻，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叙事形式

2006年，我从奋战了近十年的珠三角报社采编一线回到高校。2010年，受国家教育部高校教师访学基金支持，我终于踏上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或许因为看了太多外国文学作品，或许有英语学习的优势，也或许天生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之心，想出国长见识一直是我自上大学以来的梦想。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国家向外的门才刚刚开启了一点点。记得那时，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每周结伴去书店，用省吃俭用的钱奢侈地购买最新的西方文论译著，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博尔赫斯、伊格尔顿、卡希尔、房龙等等，然后饿着肚子回来，囫囵吞枣地阅读和讨论，无论能否完全看懂，我们每天都把这些遥远又闪光的名字，如同老人念叨几辈子的邻居一样挂在嘴边。在当时，国家对大学生就业政策正处于统一分配与自由就业之间的过渡阶段，“哪里来，哪里去”，所以我们系大部分毕业都做了家乡大小城市的中学语文教师。

想走出去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面临的新问题。我本科学的是中文，硕士阶段专攻先秦两汉文学，博士阶段则师从饶芃子先生研究文艺学，就是说所受教育都是文学专业。而就职业经验来说，我供职最长时间的领域却是新闻媒体，如报社或杂志社。进入新闻高等教育职业后，我面临的两大职业使命就是讲课和科研。做了十年媒体，讲课自游刃有余，但我必须

解决自己今后学术科研方向的问题。我内心的矛盾在于，新闻是一个特别强调应用性、实践性的学科，而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渗入我灵魂深处的文学是我的毕生追求，然而新闻学院毕竟还是要围绕新闻和传播来展开研究。那么，适合我的道路在哪里？

2010年10月初的近午夜时分，我一个人到达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著名城市圣路易斯。圣路易斯机场空荡得瘆人。直至后半夜，我终于拼到车离开圣路易斯机场，并在两小时后到达密苏里大学所在地：小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市堪称美国中西部如星星般分布的、以一所大学为中心而形成的典型小城。不到10万的人口，居住着黑白美国人，亚裔稀少；四季分明的大自然，每个季节的景色都美到你想哭。自中学开始就打下的英文基础大大帮助了我的异国学习生活。跟课程、听讲座、参加各种讨论组，参与教授项目，包括去圣路易斯开全美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第94届年会，赴纽约调研媒介巨头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道琼斯公司、彭博社等，满满的学术日程表。这些活动极大地增进了我对国际一流新闻教育的认识，大大地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直至第二学期，我终于找到我愿为之持续努力的学术方向：文学新闻。

第二学期，我选修了由伯克利（Hudson Berkeley）教授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并任他的助教。伯克利教授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每每出现在课堂，无论西装革履还是一身便装，永远衬衣雪白、领袖平整，从头到脚精致优雅，已然松弛的下巴也难掩他年轻时的帅气和如今的绅士派头。这门课的名称是：美国文学新闻。一个班共有17人，包括三名博士和十几名硕士。整整一个学期，几乎没有一个同学无故缺席。其中有一个叫威廉的大胡子博士生最令我印象深刻。虽然他需要借助轮椅和单拐杖才能出行，但每当我们进教室都会发现，威廉早已笑眯眯地稳坐大圆桌旁。我一直想问他是怎么到教室的，尤其风雪弥漫的大冷天。要知道密苏里的雪天那是转眼就可以把各种款式的汽车变成大小白馒头的。后来终于见到他女朋友，估计是来陪读的。我们每堂课都设有snack time，snack time不仅能增添课

间能量，还是大家交流某个记者或作家的写作轶事的机会。一个学期中，单是经我手进入课堂的资料就包括近 50 本文学新闻代表作，近 10 部纪录片，还有各种打印资料，我还组织大家参加了哥伦比亚市的纪录片电影节（“Festival of False or Truth”）。电影节展示的电影内容皆是对美国社会影响力巨大的纪实新闻故事，如《头版头条》《海外特派员》《公民凯恩》《总统班底》《王牌在手》《寂静的春天》《这里再也没有孩子》等等。最后，我以对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叙事分析而结束了这门课。可以这么说，这一学期的课程向我打开了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世界，令我脑洞大开：这不正是我苦苦寻觅的学术方向嘛！

所谓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就是指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完成的纪实性新闻叙事，而不是字面上的有关于文学的新闻，所以精准的说法应该是“文学性新闻”。概念包括两层意思：一、所写必须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非主观（个人或集体的）虚构；二、叙事方式从框架到文字、句式表达都带有一定的个性化的文学艺术色彩。于是，新闻客观主义者认为它太多主观性表达，所以不属于正宗新闻研究家族成员；而那些精英批评家则认为它是写事实的，高贵的文学殿堂不愿给它安置一个位子。所以，这种文体从出现开始就命中注定带有边缘和交叉学科的色彩。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传播学院的约翰·C. 哈索克教授则称之为“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出现”。当时伯克利教授为我们选取的主导教材就正是哈索克教授的《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出现》。在这本译著中，哈索克教授提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认为他的九卷本叙事体《历史》其实就是最早的文学新闻。

希罗多德的所谓叙事体《历史》其实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历史，最初的名字应该是“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从写作方法和结构来看，《历史》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中，再嵌入一个又一个插话故事，甚至插话之中再插话，环环相扣，形成引人入胜的“故事链”。而这正是东方文学的传统特色。每卷可能以某个王为中心，也可能是以历史长

河中的某个精彩片段的某个细节、某段对话开始，整体叙事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就是怎么讲得好看怎么讲。希罗多德《历史》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认为《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巨著，开欧洲散文文学的先河。苏联学者卢里叶在《希罗多德论》中认为“严肃的科学内容跟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结合在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比希罗多德晚出生 300 多年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完全可与前者媲美。《史记》以 130 篇、50 多万字的巨制，全面展示了自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期间 3000 多年的社会状况，首创纪传体编史方法。它如同一个历史场景与人物的绵长画卷，其中描绘的人物栩栩如生，堪称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瑰宝。鲁迅赞美《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西汉大学者刘向评《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司马迁的《史记》，其写作成就的本质在于用文学的方式记叙历史及当代故事，是典型的文学性新闻。也就是说，这种文体并不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才有的，而是现代社会后这种文体开始兴盛。至今，这类兼具纪实功能和文学手法的写作依然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重要部分。“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评选出的“世纪之书：20 世纪最重要的 175 本书”中，此类著作几乎占到三分之一还多。在全美主流新闻传播类学院开设的课程中，文学新闻是本、硕学生的必选课。课程基本教学用书就是哈索克教授的这本《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出现》。从国际范围看，文学新闻研究有真正全球性的 IALJS（国际文学新闻研究学会）组织，每一次的学术年会吸引了来自欧洲及南北美洲近 20 多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参与，至今年会已举办到 12 届。2016 年 5 月，第 11 届国际文学新闻研究学会年会在巴西南大河州天主教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150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院研究者，包括两名博士生参加了会议，笔者应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新现实’和中国报告文学的新趋势”为题做了主题发言。

2014年3月，笔者在《新闻大学》发表题为《作为文学新闻的“我们的”报告文学》一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我国报告文学和国际学界的“文学新闻”之间的文体关系，以呼应哈索克教授之前题为《报告文学：“他者”的文学新闻》(Literature Reportage: The “Other” Literature Journalism, 见*Genre: Formes of Discourse and Culture*, XL, Spring/Summer 2009)、就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以及南美洲一些国家有关报告文学的研究。在这之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沛芹教授将美国“文学新闻”的概念引入到国内学界。2015年9月，本人以“中美文学新闻叙事比较”为题的课题获国家教育部一般社科项目立项（项目编号：x2xcY），为进一步展开此领域的研究取得有力支持。那么，为何我们早在司马迁时代就有此类写作而至今没有“文学新闻”而只有“报告文学”的理论概念呢？正如我在上文中阐述的：

捷克犹太作家基希是中国人熟悉的与中国报告文学起源紧密相关的名字。事实上，中国最早使用“报告文学”一词来源于1930年从日本翻译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这是“德国的一种新兴文体”。1932年，基希访问中国并写作《秘密中国》一书。对此，记者萧乾曾回忆说：“我不能准确预言我们的‘特写’最终会发展成怎样的形式。我只是记得在三十年代期间，捷克作家基希来到中国，他将他的‘特写’这一文学形式带到我们国家来。”显然，热衷周游世界的基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将这一新兴的自己也乐于实践的新闻写作文体推广到全世界。随着国际共运的蓬勃发展来到中国的“报告文学”如同在德国、中欧国家及苏联的情况一样，旨在反映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赞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预言共产主义最后必将胜利的主题。

显然，我国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呈现出今天的写作面貌，是对具有极大文体弹性、内容包容性的叙事性新闻写作，也就是文学新闻写作的“窄

化”，而且这种“窄化”是由我们国家特殊的发展历史决定的。这种“窄化”写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革命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发挥过不可低估的历史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技术使中国社会进入巨大转型期。从各大报刊到自媒体，基于原有单向传播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报告文学“人民性、真实性、艺术性”等写作原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学者提出，报告文学应该从原来的“人民性”向“人类性”转变。它意味着，一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普通人，只要你的故事具有非同一般的趣味或意义，你的故事就可以以报告文学的写作方式得以流传。而所谓“真实性”也因为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海量信息构成挑战。今天的读者会从一个和原来迥然不同的视角看报告文学中曾追求的高大全模范人物。“艺术性”建立在前两者之上，若对前两者有怀疑，艺术更无从谈及。所以，正确认识报告文学的前世今生从而做出改变，才可能让这一文体在当下和未来继续充满生命力。

事实上，多年来，有文学“轻骑兵”之美誉的中国报告文学其实一直“存在轻视和忽略文学性的现象，有些报告文学作品在重视思想深度、批判力度和作品信息量的同时，走上了过分学术化、综合化、史料化的歧途。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语言粗糙，形象干瘪，结构失当，成了人物事迹、史料、文献、数据的简单堆砌，迷失了独立的文体创造价值，弱化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写作难度越降越低，离艺术与美的距离越行越远，其‘文学’身份不可避免地招来质疑”^①。由于多年关注美国文学新闻写作，我发现报告文学要想遵循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原则，完全可以借鉴美国文学新闻，并结合我国自身的写作传统加以探索。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优秀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者也不乏其人。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是全球唯一有关报告文学的大奖，其评委之一杨小滨评价2003年获奖者江浩的获奖作品《盗猎揭秘》时说：“在最基本

^① 李冰：《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光明日报》2014年11月24日第013版。

的层面上打动人的，我以为是作者的敏锐而透彻的观察力、叙事中的传奇和戏剧因素以及文体的丰富张力。”与“文体张力”并存的问题就是对语言的掌控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风格问题。近年较为活跃的写作者李春雷的《朋友》《赶考》《党参沟纪事》等是报告文学从新闻回到文学的成功范例。作者善于以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式、文学的语言，富有表现力地再现对象，使作品尽显非虚构叙事之美。

近年致力于纪录片研究的著名学者艾晓明有句话说，文学系推开一扇门就是新闻系。这不仅是以前多数大学的新闻专业都设置在文学系里面，后来简单剥离，成为独立新闻系，这句话更是形象地描述了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天然密切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无论是文学还是新闻，皆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新闻之本体论在于真实，而文学，尤其是叙事性文学，则以故事的叙事之美和读者产生审美共鸣，从而认知世界。百多年来，所谓主流新闻理论和实践原则证明，仅仅“信息模式”（美国新闻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语）的新闻形式无法完全实现新闻向人们揭示真相的神圣使命，也无法满足读者对于真相的永恒诉求。舒德森将新闻归纳为两种模式或类型：一是“信息”模式的，二是“故事”模式的。他指出，所谓“信息”模式的新闻，其实早在所谓客观新闻主义大行其道的100年前，就显示出对接近世界真相的无力感。那时候，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视自己为科学家，实际上将新闻与社会学研究混为一谈；如今，互联网技术加剧了新闻的碎片化过程，“信息”模式的新闻正面临完全失去新闻本体意义的危险。那么，何谓舒德森的“故事”模式新闻呢？那就是叙事性新闻。这正是笔者向国内学界译介哈索克教授此书的原因所在：力图通过哈索克教授对美国文学新闻文体发展的历史研究，让我们从域外的视角深刻地认识这个文体，并阐明文学性新闻的存在不是美国或欧洲才有的，我们本来就有类似司马迁的《史记》或《徐霞客游记》这样伟大的文学性纪实写作传统！

本书还在唤醒中国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无论从故事模式还是叙事方式都已面临巨大困境。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需

要深度纪录来回馈历史，1990年代的文学写作者们以强调个人的、身体的、物质的、日常的、破碎的经验来抵抗对公共记忆的简单图解。而近十多年来，如何将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进行有效的转化，如何将文学重新唤回到社会公共空间，已成为中国文学面临的内在困境。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形态因巨大转型而呈现多样、快变和复杂，另一方面是作家难以接近现实的艺术象牙塔，两者之间巨大的隔膜导致文学几乎淡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学新闻文体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为当代文学如何摆脱内化式的“个人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它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挑战并且丰富了对文学本体的认识。而近年来的报告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其实越来越呈现明显的文学新闻特质。课题研究将从创作现实出发，给予这种既秉持内心的敏锐又不沉溺于主观自我、既有现实关注的真实质感又不乏审美创造的艺术质感、将故事真实与叙事艺术完美结合的写作给予明确的文体确认。理论上“有根”的归属感不仅会深化这种创作未来的理论研究，而且会大大克服创作者的迷茫，增加其创作本身的文体意识，从而产生更优秀的作品。

有关美国文学新闻的研究还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新闻写作走向更高的平台。相比一系列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文学新闻作品，中国写作者面临的客观世界及题材选择的丰富性、震撼性理应产生大量优秀的纪实新闻作品。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相当的业内人士依然没有认识到，时至今日“人民性、真实性、艺术性”依然是报告文学的叙事原则，但创作者必须认识到，社会变革和人类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潮流，已经全方位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它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义原有的报告文学的叙事原则，重建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艺术、语言艺术、叙事艺术，学会讲故事，学会讲中国故事，给真实故事一个艺术化的表达。而欧美文学新闻正是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新闻在不断加剧的互联网技术时代越来越碎片化，也越来越让人感到无从真正地认识所谓的“真实世界”。所谓文学新闻，所谓对事实的叙事化

再现固然是出于写作者之笔，注定带有写作者本人的主观意识烙印，但当读者的主观意识，能通过写作者的主观意识，尽可能地接近世界真相，尽可能地缩小了主客观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对认知事实世界产生共鸣的时候，谁说文学新闻没有实现“新闻”再现真相的伟大使命呢？文学新闻就是艾晓明教授说的，连接在文学系和新闻系之间的那扇门，是连接写作者和读者主观意识的那扇门，是连接人类主观意识和客观现象世界之间的那扇门。

这扇门可以是无比精美的，那因为它是基于事实之上的叙事之美，是人类精神交汇处的一种伟大审美形式。

这正是本研究所致力的意义所在。

李 梅

2017年3月中国·广州

前言

几年前，当我着手文学新闻学术研究的时候，我采取了一种对我来说较合理的探寻文体的历史路径。为了使研究课题获得一个广阔的视野，无论这种历史是怀有偏见还是不完整的，它都能成为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文学新闻的理由。即使任何有缺陷的历史也能为过去的批评语境提供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是，当我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形式的历史”的时候，你可想象我有多吃惊。当时，看似有两个路径来接近这一困境。首先就是舍弃这一研究项目，转向其他已经被充分研究的学术主题，那样的话，我此后的研究工作量将不会太过繁琐费力。第二就是将这个文体的历史研究的空缺看成填补学术空白的机会。我承认我最初是选择舍弃项目的，我担心写出一本缺乏历史观的有关文体历史的书，被这个担心吓得退缩了。但过段时间后，也许更像是赫克·芬恩（Huck Finn）发现俄克拉荷马领土是个机会，我开始将此视为机会。自此，我相对感觉到了研究的自由，我发现我实际上拥有一个随意驰骋的宽广的奢侈研究领域。后来证明这个认识成为完成此书的最关键因素。

当我接触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是扎根于“过时的”“新批评主义”土壤中的文学爱好者之一。因此，我还是很感激这个“界定准则”的。但我的另一面却显然追随于更新的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批评潮流。结果就是，我的研究比一些纯文学史的研究更理论化，因为，我也的确是属于那类相

信历史是高度理论化和主观化的人。还有个结果就是，全书使用第一人称，这也有意识地回避了所谓史学的全客观态度。我之所以这样做，可以在《让我们赞美名人》中找到原因。当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 239）观察那些他所描写的佃农时，他写道：“乔治·格杰（George Gudger）是一个人。但是，显然，要我尽可能完全真实地讲述他，也是有限的。我只掌握那些我尽可能知道的，而且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算是了解他的；这一切都还依赖于我是怎样的人及他是怎样的人。”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史学家和历史的关系。我很容易领会其中固有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范和方法论。但我认识到，它确实意味着，我的这本美国文学新闻史研究正如同所有历史研究一样，是一种时间的阐释，就是说，不仅努力反映（不管有多不完美）过去时代，同时也毫无疑问地反映我们当下的时代。

本书的读者应有三个部分。首先，虽然我的研究还有诸多不完美，我在意那些期待拓展他们文体背景知识的有关英语文学、新闻、大众传播及美国研究的学者和教师，本书定能使他们有所收获。如此广泛的读者将使我必须不时沉湎于那些文学或新闻业看似老生常谈式的历史：对学院的专业研究者来说那些也许并非陈旧。我也在意那些想完全探索文体演变过程的研究生或高年级的本科生。其次，这也导致研究不得不时时陷入历史的诸多材料中。我只能希望他们从我们学生的趣味出发，谅解我对于历史文献的采用。再次，我在意那些此类文体写作的实践者和职业记者们，但愿他们能原谅文中那些在他们看来也许过于温柔敦厚的批评语言，这正是学院派之所以因脱离“现实”世界而备受诟病的原因。出于自我辩护，我要说的都在此，只需简单理解就是。的确，“言简意赅”式的研究最大的冒险就在于难以抵达认识论和本体论所要求的矛盾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如果第三组读者群给予耐心，我希望他们能发现，文学新闻实质上是和古代的诗歌和戏剧一样庄重的事情。文学新闻之根源确实可至少追溯到西方传统上的古典时期。